

总策划 张余胜

# 中部西藏与蒙古人

## ——元代西藏历史（增订本）



丛书主编 余太山

〔意〕伯戴克 著 张云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 中部西藏与蒙古人

——元代西藏历史（增订本）

丛书主编 余太山

〔意〕伯戴克 著 张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部西藏与蒙古人:元代西藏历史/(意)伯戴克  
著;张云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9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ISBN 978-7-311-03525-9

I. ①中… II. ①伯… ②张… III. ①西藏—地方史  
—研究—元代 IV. ①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786 号

总 策 划 张余胜

- 
- 书 名 中部西藏与蒙古人  
——元代西藏历史(增订本)
- 丛书主编 余太山
- 作 者 [意]伯戴克 著  
张 云 译
-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mailto:press@onbook.com.cn)
-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 开 本 710×1020 1/16
- 印 张 12.5
- 字 数 173 千
-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311-03525-9
- 定 价 38.00 元
-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高华

---

委员（按拼音顺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锦绣 李勤璞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颢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余胜

---

副主任

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  
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

---

委 员(按拼音顺序)

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  
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  
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  
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  
夏 玲 邢 玮 张东林

## 出版说明

---

随着 20 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 20 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 总序

---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 and 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2010年6月30日

## 导 读

L. 伯戴克教授(Luciano Petech)是继图齐教授(G. Tucci)之后意大利最杰出的一位藏学家,也是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藏学家之一。他1936年毕业于罗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55年担任罗马大学教授;1989—1995年担任国际藏学会主席,意大利罗马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现在家安享晚年。

伯戴克教授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于中国史和中国印度关系史,以及印度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特别是中国西藏研究和喜马拉雅山国历史研究方面。他勇于探索,勤于著述,著作等身,成就辉煌。他的研究涉及藏学研究的诸多方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吐蕃历史文献与历史研究方面:伯戴克教授发表了《敦煌编年史考释》(Glosse agli Annali di Tun-huang, RSO, 42, 241-279. Repr. in Petech, 261-299, 1988)、《伯希和藏文卷子1287号的结构》(La Struttura del MS. Tib. Pelliot 1287, RSO, 43, 253-256. Repr. in Petech, 309-312, 1988)、《吐蕃王朝的瓦解》(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ibetan kingdom,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pp. 649-659, Edited by Per Kvaerne,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等文章。

在元代西藏历史研究方面:伯戴克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成果,例如,《桑哥,元朝中国的一位藏族宰相》(《匈牙利亚洲东方杂志》,第34卷,1980年,第193-208页;校正后的再版,见伯戴克1988年,第395-412页。Sang-ko, a Tibetan Statesman in Yuan-China, in AOHung, 34, 1980, 193-208, reprinted with some corrections in Petech 1988, 395-412)。在这部著作中,伯戴克依照藏文史书《汉藏史集》等书的记载,认为担任元朝右丞相的桑哥是藏族人。他的《蒙古在西藏

的括户》(M. 艾里斯编辑《H. 黎吉生西藏研究纪念文集》,沃明斯特,1980年,第233-238页。The Mongol census in Tibet, in M. Aris, ed.,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Warminster, 1980, 233-238)一文专门探讨了元朝在西藏进行户口清查的问题。《元代西藏边缘地区的机构》(于伯赫和J. L. 邦隆编辑《藏学研究》,慕尼黑1988年。Yuan organization of the Tibetan border areas, in H. Uebach and J. L. Panglung ed., Tibetan Studies, Munich 1988, 369-380)分析了设立在西藏本部地区边缘地区机构的情况。而他的《元代和西藏有关的帝国王子们》(载T. 斯科鲁普斯基编辑《印度—西藏研究: D. L. 斯内尔格罗夫教授纪念文集》,特灵,1990年,第257-269页。Imperial princes of the Yuan period connected with Tibet, in T. Skorupski ed., Indo-Tibetan Studies: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D. L. Snellgrove, Tring 1990, 257-269)则考察了参与经营西藏并与涉藏事务有关的几位元朝王子的情况。此外,他还对《吐蕃与宋蒙关系》(Tibetan relations with Sung China and with the Mongols in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Morris Rossabi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73-203)进行了分析研究。

在清代西藏历史研究领域:伯戴克教授著有多部具有很大影响的著作,诸如《18世纪初期的中原和西藏》(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 III 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T'oung Pao. Monographies, 1.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50, 1972)、《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与政府》(Luciano Petech, government and aristocracy of Tibet, Is. M. E. O, Roma, 1973, aris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 1728—1959)等,特别是后者,较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清朝西藏贵族的历史,对于理清地方上层之间的关系、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帮助人们了解清代西藏上层贵族家族历史,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他的《拉藏汗:西藏的最后一个和硕特统治者》(Lajang Khan, the last Qosot ruler of Tibet, 1705—1717)对这位和硕特蒙古汗王拉藏汗的生平事迹作了系统和扎实的研究,而他的《西藏的达赖喇嘛

和摄政：一个编年史研究》(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 a Chronological study, T'oung Pao, Volume 47, Numbers 1-5, 1959, pp. 368-394 [27], BRILL)-·文,则对清朝西藏地方的另一项制度——达赖喇嘛和摄政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勾勒。他的《1860—1880年到西藏的中国和欧洲旅行者》(China and the European travellers to Tibet, 1860—1880, T'oung Pao, Volume 62, Numbers 4-5, 1976, pp. 219-252, 34, Publisher: BRILL)还探讨了内地入藏旅游者和欧洲前往西藏的旅行者的相关史事。

在西部西藏区域史研究领域,伯戴克教授同样做出了突出的成就,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拉达克编年史研究》(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Indian Tibet], Reprint of the 1939 Calcutta edition. Delhi: 1999)、《公元 950—1842 年的拉达克王国》(The Kingdom of Ladakh c. 950—1842 A. D.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51]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1681—1683 年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The Tibetan-Ladakhi-Moghul War of 1681—1683, India Historical Quarterly, 23, 1947, pp. 169-199)、《在西部藏区和拉达克的止贡派》(Petech, Luciano. The 'Bri-gung-pa Sect in Western Tibet and Ladakh, in proceedings of the Csoma de Körös Memorial Symposium, Held at Matrafüred, Hungary, 1976, Louis Ligeti [ed.],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78, 313-325)、《雅泽、古格、普兰:一个新的研究》(Ya-t's'e, Gu-ge, Pu-rañ: a new stud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24 [1980], 85-111)、《古格普兰地区年表》(A regional chronicle of Gu ge pu hrang,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 VIII 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Autumn Vol. X XII, No. 3, 1997)等。

在西方传教士在西藏活动历史方面:他编著的《去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7 卷本)(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是研究意大利传教士在西藏活动无与伦比的重要资料;《藏文文献中有关特纳和博格尔出使的记载》(Luciano Petech. The Missions of Bogle

and Turner according to Tibetan Texts in T'oung Pao X X IX, 1950: 330-346), 利用藏文资料补充了特纳和博格尔出使中国西藏地方的史事。

此外,伯戴克教授还著有《尼泊尔中世纪史》(Mediaeval History of Nepal, [c. 750—1480] 2nd revised ed.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54], Rome: Institute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4)、《亚洲史选集》(Selected papers on Asian history, Institute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Roma. 1988)和《水经注中的北印度》(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Is. M. E. O, 1950)等与西藏历史研究有关的成果。

伯戴克教授的许多研究成果曾被翻译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比如:《18世纪初期的中原与西藏》(周秋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1728—1959 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沈卫荣、宋黎明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以及他的一系列论文,应该说,伯戴克教授是中国藏学界十分熟悉的一位著名藏学家。

—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Petech, Luciano;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uan 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65, Rome: Institute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90),是伯戴克教授晚年的一部力作,同时也是作者10余年来研究元代西藏地方历史的一个总结,系统反映了作者对元代西藏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在我个人看来,这也是近20年来国外元代西藏史研究领域水平较高的一项成果,值得一读。

本书共分6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主要的史料。汉文资料作者主要利用的是明初官修的《元史》一书,尽管该书存在着撰修仓促,以及官方立场的感情因素等问题,但依然是元代西藏历史无法或缺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元史》卷87《百官三》宣政院条、《元史》卷202《释老传》、《元史》卷205《桑哥传》,以及本纪的相关资料等,价值仍不容低

估。藏文资料无疑是作者十分关注的一块。他把藏文历史著作划分为3个主要种类：“即圣徒传记(mam t'ar),世系谱(gduñ rabs)和王朝史(rgyal rabs)或教法史(c'os'byuñ)。其中第一类,通常只涉及它们的主人公的学习、传授和宗教上的发展;世俗的资料只是少量的。世系谱著作是最为有用的,尽管在许多场合它们变成了纯粹的人名目录,以及带有一些日期和粗略史料的人物肉体与精神关系表。第三类在所有的用途当中,通常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例如,《布顿教法史》(1323年),索南坚赞(bSod-nam-rgyal-mts'an)《世系史》(1368/1369年)和白玛噶波(Padma-dkar-po)的《教法史》(1575年)。一个突出的例外是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编年史》(HT5D:1643年),它大部分抄袭了《汉藏史集》(GBYT)一书,但是,有时也包含了在别处见不到的资料。”第二部分,作者重点探讨了元朝与萨迦地方政教势力合作关系的建立,并把它们以126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被作者描述为这种关系初步确立阶段。“1219年,当时坐镇北京地区、防备女真(Jurcen)势力复苏的木华黎(Muqali)元帅,曾带来禅门临济宗的一位年轻僧人海云(Hai-yun,1202—1257年),引起成吉思汗的注意,随后成吉思汗征战中亚。在这一时期,皇帝同意汉族僧人免纳赋税和徭役,成吉思汗的后代继承者们延续并进一步确认这一特权。”

接着,本书探讨了蒙藏的早期接触,阔端邀请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谈,确定西藏归附大蒙古国之下,以及蒙哥汗对西藏的治理,八思巴从窝阔台系转至托雷系的忽必烈麾下等。“在1258年,八思巴开始依照藏传佛教的神秘教义,向忽必烈传授。这一事件,依照后世萨迦派的说法,把它看做是西藏人在蒙古人世界传教的真正开始。在同一年,他参加了第三次佛道辩论会,在此之后,他的晋升得势趋于稳固。忽必烈明确地选择他作为自己在西藏问题方面的顾问和工具。”后一部分则考察了1260年忽必烈登极以后,任用八思巴,在西藏地方实施各项政策与制度,以及平息西藏地方出现的叛乱事件;对八思巴在西藏的活动,本钦释迦桑布、白兰王恰那多吉、桑哥、阿迦仑等重要人物的事迹,处死贡嘎桑布、平定“止贡之乱”等事件,以及施行各项管理制度,都有

简要的说明。

第三部分是研究元朝西藏制度结构,内容包括:第一,元朝设立在中央的机构即总制院和后来的宣政院和职官设置等情况。第二是帝师,伯戴克教授认为:“帝师是帝国政府中一个常设的职位,他享有无上的荣耀,部署重大安排,在总制院以及后来的宣政院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宣政院的院使之一是由他推荐的。不过,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不管帝师如何受到尊敬,他只是皇帝设在朝廷的一名官员,很难进行任何违背蒙古人利益的行动。在中部西藏,他的法旨如同皇帝的圣旨一样具有效力,但是,他的命令是在地方机关官方文件的范围之内传达的。如夏鲁文示帝师发布命令(当,gtam)是在皇帝的权力(龙,luān)之下才有意义,尤其是在财产和特权的批准方面。除此之外,他没有直接参与对于中部西藏政府的实际管理。”第三,是元朝廷设在乌思藏地区的机构,即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使司都元帅府,也即乌思藏宣慰使司。随着机构的设置,蒙古的大量职官和机构用语也引入西藏。元朝在那里驻扎着军队,“一些帝国的王子把持着统帅职位,并在属于西藏北部的管区内拥有封地,能够发布涉及恩准特权和任命官员的命令(令旨,lingji),就像帝师一样”。第四,是本钦问题。伯戴克教授认为:“本钦以他自己的权力管理萨迦寺的土地财产,除此之外,他以其能力作为帝国的一名官员在宣慰司的控制下行事。在此前提下,他是中部西藏自治政府的首领。”同时,伯戴克也分析了“乌思藏宣慰使”与“本钦”之间的关系。第五,考察元朝在西藏地方实施的人口普查问题。分析了人口普查的时间、承担普查的官员及乌思和藏两部分的范围、计量单位(霍尔都)、计算上的十进制制、僧户和俗户,以及最后获得的人口数据。第六,征税。元朝之所以在西藏地方清查人户,其目的就是为实施征税,“在西藏和在汉地一样,人口普查之所以最为重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家庭名册为整个地区的行政与财政体系提供了赖以依存的基础。从这份名册开始,在帝国全境实施有效的统一政策。蒙古人分配给作为庶民的西藏百姓的三项主要任务是:当兵、纳贡和服劳役(玛差勒松,dmag k'ral las gsum)”。 “中部西藏的民兵组织

是由本钦号召并指挥的,而且,它是由每一个万户提供人员而建立的,所提供兵员数目与其霍尔都的数目成一定的比例。”此外还包括,什一税和乌拉差役。第七,万户府。作者依据藏文史书《汉藏史集》的记载,考察了元朝在西藏设立的十三万户,“万户通常划分为两组:六个位于藏地和纳里速,六个位于乌思地区,另一个位于乌思和藏的交界地区。1268年的人口普查,正如由阿袞和明灵在藏地,阿什杰在乌思拟定的官方记载里确定的那样,给每个万户派定一定数量的人口单位(霍尔都)”。第八,驿站。伯戴克教授认为:“就藏族地区而言,最初建立驿站在蒙哥可汗时期,当1253—1257年时,兀良合台(Uriangqadai)的军队远征姜域(Ujan,云南),下令在脱思麻(多麦 mDo-smad,安多 Amdo)建立了两个驿站,与先前存在于汉地的驿站连接起来。另外两个驿站设在多堆(mDo-stod,康区),在喀热(Ga-re)和郭贝(Go-be),它们对同乌思藏的交通联络是极为有益的。”他还分别考证了驿站的位置。不过作者认为“乌思藏地区的驿站是在1269年建立的”。经过笔者考证,这一年代应该是1264年(张云《答失蛮其人及其经略吐蕃考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

第四部分是“元朝—萨迦统治的稳定时期(1290—1330年)”,重点探讨了昆氏家族嫡系后裔达玛巴拉(恰那多吉之子)去世(1287年)、“止贡之乱”(1290年)、桑哥被处死(1292年)和忽必烈晏驾等一连串事件之后,西藏地方历史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主要围绕两个线索:一个是历代本钦管理乌思藏地方事务及相关业绩情况,例如阿迦仑的出色成就等,一个是萨迦昆氏家族内部发生的变化,即原来受到排斥,被放逐到江南普陀山的达尼钦波桑波贝,因为达玛巴拉的去世萨迦昆氏面临绝嗣而被召回萨迦,并众娶妻子,繁衍后裔。“如果说,在他出生时昆氏家族真正存在的问题是对后嗣缺乏的恐惧,那么,在他的去世这个问题上,则完全相反。他对皇帝的劝告忧虑于怀,并认真履行了使他的家族得以永存的任务。他的妻子们(1位蒙古人和5名西藏人)为他生了13个儿子。这些儿子中的11人,直到他去世时依然活着。继承权的问题也许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公元1322年,在担任元朝帝师的他的



第二个儿子衮噶罗追坚赞(《元史》译作“公哥罗古罗思监藏”Kundga'-blo-gros-rgyal-mts'an)的主持下,简单处理,把西藏地区一分为四,形成细托(bZi-t'og)、拉康(Lha-k'an)、仁钦岗(Rin-c'en-sgan)和堆却(Dus-mc'od)四大拉章,这也导致并预示着萨迦政权势力的衰弱。

第五部分是萨迦政权的衰落与崩溃,分三部分探讨代替萨迦地方政权的帕木竹巴势力的崛起。首先,作者主要利用《朗氏宗谱》和《红史》的资料介绍了噶玛巴让迥多吉前往大都的经历及其对西藏地方政局所发挥的作用。接着重点分析了以今西藏山南乃东地方为根据地的帕木竹巴政教势力的早期活动。“在1335年或者1336年初,新皇帝妥懽贴睦尔试图牢固地控制在西藏的行政管理权,便派去了两名官员:藏族人士司徒旺尊(dBan-brtson)和畏兀(维吾尔,Uighur)人钦察台平章(Qipchaqatai)。他们担负着两项使命:一是召请喇嘛顿月坚赞(Lama Don-yod-rgyal-mts'an,属于仁钦岗拉章)前往首都,一是完成校订人口普查和征税的一次总检查工作。第一项使命,未能到达目的,因为那时顿月坚赞没有离开西藏,但是,第二项使命却按时完成,这主要得力于钦察台。”萨迦派面对帕木竹巴的崛起,联合蔡巴、唐波且、雅桑等,在本钦的领导下联合对付绛曲坚赞。其次,作者分析了绛曲坚赞和帕木竹巴万户的危难与成功。元朝曾经在1344年和1345年连续派出两批钦命使者,前往乌思藏清查人户或者校订人户数额,审理纠纷,并恢复地方正常秩序。绛曲坚赞既面临着挑战萨迦权威自身政治上的合法性问题,又面临着强大联军军事上的压力问题,经过艰苦努力,他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在赢得军事上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从而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第三,作为西藏地方新的帕木竹巴政权的巩固。绛曲坚赞成功抵挡住来自本钦甲瓦桑布部联军所带来的压力,逐渐控制了乌思藏地区局势,伯戴克教授认为:“帕木竹巴的军事控制,是通过曲弥的永久性占领而得以巩固的,尽管它形式上是细托拉章的一块领地,它是重要的驻防地,并且,安排多杰坚赞作为管家(gner),主要负责管理事宜。”1261年,他在大局已定的条件下派人到元朝廷,请来了“大司徒”的印信,从而获得合法身份,名正言顺地取代了萨迦